

梅贻琦的李庄八日

侯宇燕

1941年春夏，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借联大总务长郑天挺、语言学家罗常培从昆明入川，并在川南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梁思成、林徽因的中国营造学社生活了八天。这八天宝贵的所见所闻、生活点滴，悉数被他录入日记中。

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郊19公里处的长江南岸李庄坝，是有着1460年建镇史的长江边上的千年历史文化名镇，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之一。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史语所傅斯年等几十位专家署名镌刻的《留别李庄栗峰碑铭》云：“尔来五年……幸而有托，不废研究。虽曰国家厚恩，然而使客至如归，从容乐居，以从事于游心广意，斯仁里主人暨军政当道、地方明达，其为藉助，有不可忘者。”对这座古镇的人民，对史语所所在地板栗坳表示了最真诚的谢意。

李庄既成为抗战文化中心而闻名遐迩，对李庄的社会、经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及了无数李庄人。已故翻译家周懋庸，其母即为李庄板栗坳后人。少女时期的周懋庸，就和住住板栗坳的同济大学师生有很深的交往，与教授之女祝希媛（著名演员祝希娟之姐）还是同济大学附中的同窗好友。随着抗战胜利，这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陆续复员返城，周懋庸也跟随潮流走出了板栗坳，走出李庄，走向上海、南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半个世纪后，周懋庸提笔写下记录大后方这段波澜壮阔岁月的长篇小说《长相思》，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大奖。此书前半部即以珍贵笔墨，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富于诗意地记述了抗战时期中研院史语所、同济大学等内地高等研究机构发生在李庄的种种美丽故事。

若将《梅贻琦日记》中关于李庄风俗、人物的八天珍贵历史记录与长篇小说《长相思》里栩栩如生的种种故事，相关的史料凌波比照，得到的会是一种引人入胜、趣味横生的阅读效果。

一、李庄坝

梅贻琦先生是1941年6月27日到达李庄的。那个星期五，川南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热的时段，所幸“晴热，船上尚风凉……”

3点40分开到李庄后，“下客尤多，行李零物幸无损失”。梅先生由“地漂”登岸，“抬头一望，有奎星在焉”。临江还有一座“君子居”茶楼，一行人饮茶小憩后，再至街内李庄饭店进餐……“行未远又闻轰炸声自东方传来。街上人甚多，为赶场者”。以上种种就是梅先生眼中的李庄，20世纪中叶四川集镇生动的缩影。

而周懋庸笔下，生于斯长于斯的李庄，又是什么样的图景呢？自然会更加丰富多彩了。巧的是，她也是从江行到岸讲起，不过讲的是李庄附近的南县：“木船靠拢南门码头，踏着跳板走上河滩，再踏上石级，石级倒是很宽，足够并排走五六个人。城里人吃水全靠挑长江水，挑水人整天上上下下，石级总是让泼出来的水打得湿漉漉的。

爬石级约有三十来级到了城门口。城墙很厚，门洞很深。夏季发大水时，水会一直漫到城门口。南县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有人来，要算好日子写信，才有人接。城唯一一条从东贯西的较宽的街是石板路。这条街上分正街、下正街。”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以四川为背景拍摄的影视剧剧中，还能看到城墙、石板路，赶街的乡民。如今想来，这条“唯一的石板路”，一定就是梅先生在饭店进餐，并描述“人甚多，为赶场者”的那条街道。

二、板栗坳

梅贻琦先生到达李庄后，首先拜访的，就是周懋庸母亲的娘家，位于板栗坳的史语所。而在《长相思》开篇，周懋庸就深情地写道：“板栗坳，藏在大山的心里。方圆几十里，找不出一颗板栗。满山漫坡尽是橘子树……舟行长江，能望到这带青山，却绝想不到山里还有这片天地。原以为这地方叫板栗坳，也许有栗树，谁知不但没有，找来种也不活，改种橘子，倒爱长。”真是神奇之地！

周先生说，板栗坳属南县九龙镇，离南县六十里，是上水，木船要半天才能得到。板栗坳离镇上又有十来里。故在梅贻琦先生笔下的1941年6月27日，需要走上二大段路，“4：35食罢，随挑夫二人前行，先经田间二里许，继行山道曲折，又约三里，始至板栗坳，时已5：30矣。”

途中，梅先生在山半一老黄果树下休息，坐石磴上俯瞰江景，“小风吹来，神志为之一爽”。至6月29日，梅氏又由考古学家董作宾引导，在板栗坳的山路上重走了一遭：“小路迂回，于山坡田间颇难辨识。途中两次迷路，经问村妇、牧童后始得前进。”

7月5日，梅贻琦“七点半辞别所中诸君下山往坝上，方桂夫夫妇等送出山许……乱离之世会聚为难，惜别之意，彼此共之也”。写的是山，更记人，记乱世人情。

周懋庸的《长相思》，切入点就不同了，是她对家乡的怀念，所以徐徐展开的是一整幅板栗坳如诗如画的长卷：

山谷间有片片水田。那盘旋而上的山路像一条长长的相思带，紧紧系住游子的心。蜀中山道，多是羊肠土路。板栗坳却有一条石板路，是孟氏族人一代代维修起来的。石板路虽一级级向上爬，但每片石板不厚，走起来不吃力。又走一段，石级变了石板平路，显然已到山顶。下老房坐落在路的右边，左边是水田，水田那端是二架小山峰，形如笔架，正对着下老房正门。

这样美好的蜀中山水与川南人情，端赖作家的如花妙笔，才能永远镌刻在后世读者心上。

抗战时期已过中年，在惊涛骇浪里前行的梅先生，和五十年后深情回忆故乡风情的古稀老人周懋庸，他们眼中的板栗坳，一略写，一详述，留下的，却都是李庄历史上珍贵的资料。

三、中研院史语所宿舍

据《梅贻琦日记》记载，中研院史语所所在板栗坳租用的，是“张家房舍”三大所，分为三院。而《长相思》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板栗坳山顶和山腰分布着孟氏家族，人称孟家七大房。”这孟氏，是否即《梅贻琦日记》中的张家，因小说笔法而变更了姓氏呢？让我们继续往下读。

同治年间，七房都很殷实。有水田、有橘子林。各自盖起大房大院。山上有的是树，房子连墙壁也是好木料。山腰上有五房人。人称下老房、上老房、牌坊头（三房在道光年间出过一位烈女，立了牌坊）。往山下走一点，一片池塘，两边两房人，就叫塘左、塘右。六房和七房在半山腰。这两房到民国年间格外发达，在县城、省城都开了字号。老房子也翻修过了。

……后来，研究所嫌镇上大学生太多，大吵闹，经人指点，找到板栗坳，大呼好一个世外桃源！和山顶上孟氏家族商量，租了这些房子，把研究所迁上了山。破落的孟家人也多少有了些房租收入。



图为电影《九零后》海报。杨振宁、许渊冲、潘际圣、杨苡、王希季、马识途……16位平均年龄超过96岁的联大学子联袂讲述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群星闪耀的故事。对这些年过九旬的“九零后”而言，西南联大不是一段尘封的历史，而是一段鲜活如初的青春记忆。

写作的热烈与翻译的清冷

黄雪媛

“最难的生活是无所谓的生活”，克尔凯郭尔在《人生道路诸阶段》里有这么一句，初读未解其意，再读似有所悟。对我而言，若想在流逝的日子里抓住些什么，让自己有所傍依，有所专情，便是写和译这两件事。借由文字，筑起敏感的自卫，在生活的平庸河流中保存一个小小的精神岛屿。不过，这也是近年来才有的认识，世上总有人早早明白了自身的使命，规划井然，因果斐然；也总有人后知后觉，糊涂度日，进入人生下半场才有所悟。看似“顿悟”，实质是过去种种经验的叠加汇聚，在某个时刻从心灵深谷陡然升起一声召唤。瞬间，仿佛所有的日子都是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而做的准备。

虽然，数数过去译的，也不算太少，拉拉杂杂近一百万字，但所译的大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有时是没得挑选，有时是情面难却。总之没有遇到心仪对象前，翻译无非是一桩“差事”，而非一项“志业”，更谈不上为之魂牵梦绕、衣带渐宽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把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为“文学纪念碑”系列翻译德国学者莱纳·施塔赫的著作《卡夫卡传——关键岁月》视为个人译路的转折点。这一回，围绕着卡夫卡，编辑与译者之间达成了高度共识。这是理想译事的起点：欣欣然、跃跃然，

又郑重其事，如履薄冰。

比起阅读卡夫卡，翻译《卡夫卡传》更能让我进入到心爱作家的生命内部，聆听那颗“布拉格德语灵魂”的孤独与狂喜，柔弱与坚韧；试着理解这位世界文学的著名单身汉的忧惧和矛盾，甚至可以大着胆子，剖析他与她笔下人物那些迷障重重的言行背后的心理机制。但是，这一切的最终目的，是在他的生命中发现自我生命状态的实在与应然。我想，翻译文学传记的理想境界，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体认与呼唤。偶尔，夜深人静，译到深处，会在心里叹一声“嗨，你这个弗朗茨呀！”仿佛感叹的是一位邻家兄弟、同学友人。在这种时候，叫他“卡夫卡”终究听起来生硬了，隔膜了。“卡夫卡”代表着疏离警惕、孤独执拗的一面。而“弗朗茨”却是

个头脑发热、内心敏感的小伙，总是写着长信、诉着苦衷；或者兴致勃勃地四处闲逛，划船游泳、唱歌爬树，乏了也不肯回家，宁愿一头躺倒在朋友家的长沙发上，惬意自在的聊天。我很愿意和这个弗朗茨做朋友。

卡夫卡的写作节奏映照着我的翻译节奏。施塔赫总结了卡夫卡写作的特征：创作的涨潮期总是突然来临，卡夫卡可以一天数小时高强度、高产能地写作；接着便是连续数周的退潮期，想象力渐渐消退，就算拼命挣扎也难以继，最后只能偃旗息鼓，陷入持续数月的停滞期，卡夫卡称之为“可耻的低谷”。卡夫卡的想象力和艺术表达力仿佛受着某种秘密法则的指挥，时而欣然开放，时而黯然关闭。每次他都投入太猛、太深，似乎要把短暂开放的灵感蓄水池一次次抽干。我由此对照自己的工作方式，发现了惊人的相似。在翻译的“涨潮期”，日工作量可达三千字。在这样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感与文本紧密咬合，就连吃饭睡觉，词语也四处游荡，在菜汤里、枕头边、梦境里；到了退潮期，每日只能译几百字，思路缓慢，行文滞涩，心情忽明忽暗；甚至有过长长的停滞期，一瞥见书封上卡夫卡望着我的忧郁模样，就想拔腿逃离……

即使在严格自律的状态下，也很难保证匀速前进。翻译即理解，或者“解释”，这个过程是似是而非、矛盾重重的。当我把自己所理解的卡夫卡换作母语呈现，随着手底下串串语言符号产出，属于汉语的独特属性，混杂以我个人语言体系偏爱的气味和色彩，产出的卡夫卡形象和原著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性状”。如何把卡夫卡复杂幽深的生命密码恰如其分地传递

给中文读者？如何让原著中的声音激起尽可能精确的回响？为此，我会提醒自己与文本保持适度疏离，甚至隐身。斯坦纳在《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提到“化身的懵懂”，(transubstantial ignorance)，这里头“蕴藏着翻译事业的悲哀，但也隐含着修复倾塌的方法”。故而，我提醒自己，译得顺畅得意之际，就越要小心“过犹不及”。反过来，在磕磕碰碰处，反而倒更“安全”些，因为速度放慢了，心里敬畏，则笔下更为小心。

译者就是在一片雾霭中摸索的人。就翻译卡夫卡传记的体验来说，是既要摸索卡夫卡欲拒还迎的古怪心意，深情又绝情的矛盾态度，又要摸索施塔赫时而博学饶舌的雄心，时而善感细致的情，这使我如同行于雾中吃，照着镜中镜。正如博尔赫斯在诗歌《罗盘》中关于翻译的洞见：“我自己也不了解的生命/ 难解之谜、机遇、密码的痛苦/ 还有通天塔的分歧不合。”可见翻译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不过，等熬到了修改校对的阶段，就能时不时品味势如破竹之畅快；再等到一章章打印出来，就可以高高高兴兴捧着温热的纸张坐到餐桌边，一碟零食，用红笔去掉错词冗赘，修正标点符号——恰如绣工完成一件经年累月的绣品，清理最后的细碎线头，自有一种疲惫的满足。

写作的专注也是要以牺牲俗世乐趣为代价。29岁时的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自己身上很容易察觉到一种对写作的专注。当我这个‘有机体’显示出本性中最可能出成果的方向是写作，一切便朝它奔涌而去，导致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性的乐趣，吃

喝喝，哲学思考，尤其是欣赏音乐的能力都停滞不前了。所有这些领域的能力都在衰退。这也是必要的，毕竟我的力量的总和实在太多，只能半道汇聚起来，统统交付给写作。”

与其说这段话反映了卡夫卡的自知之明，不如说反映了他对写作使命的高度自觉。为了写作，卡夫卡自愿压缩、甚至放弃生而为人的需求和爱好，试问世上有几人能做到这样的“绝情”？若论起卡夫卡写作的狂热，则我翻译的热度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卡夫卡会进入一种全然忘我的，同时又高度自控的创作状态——写作的乌托邦之境。短篇小说《判决》是极少数令卡夫卡满意的作品。在此之前，他长期处于自怨自艾、自我否定的情绪里，说自己写得“又少又差劲”。在经历了《判决》诞生之夜后，卡夫卡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他真正想要的写作状态和品质：

“我在22日（1912年9月22日——笔者注）夜里开始写《判决》这个故事，一口气写到23日早上6点。我从书桌下艰难地挪出久坐而变得僵硬的双腿。心力交瘁的感觉，还有看着故事在眼前渐渐展开的快乐，像在水中不断向前游荡。在这个夜里，我多次用我的脊背扛起全身之重。什么都义无反顾了，我为所有的一切，为那些最陌生奇怪的念头准备了一把大火，目睹它们在火中灭亡和复活。”

即成作品的魔力让卡夫卡身心“敞开”，他这一回迫不及待、充满信心地为一小群朋友朗读了《判决》。“读到最后，我的双手不听使唤，竟拂住脸，眼里都是泪水。这个�故事的成功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译到这一句，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个以写

里，他不仅去了史语所，还到川南其他文化机构考察过。6月29日：“晴热，蔚蓝天空，片云绝无，盖较昨日更热矣。早饭后八点半刻出发往石岩湾社会所，到石岩湾为十一点一刻，盖用时间一半矣。一点半始由所往李庄镇……饭后二点余与陶先生至慧光寺同济大学访问均时校长，谢其饭约盛意。后至巫宝三家稍坐，晤杨时逢夫妇，与巫同院住者。至羊街六号李济之家，八号梁思永、刘士能家，各稍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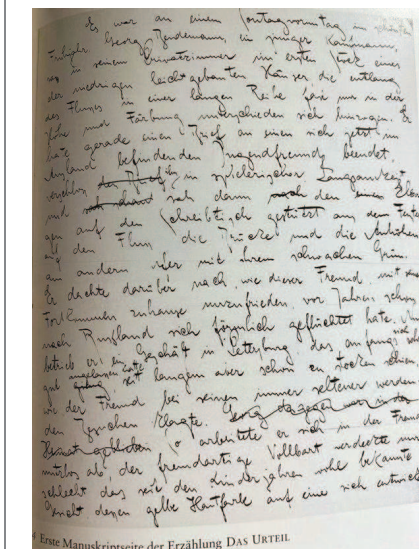
6月30日，“九点半与郑、罗、方桂下山，先至上坝营造学社参观，(约)半因卧病未起，在其病室谈话数时，未敢久留，恐其太伤神也。至博物馆办事处稍坐，然后至羊街思永家午饭。”

7月5日，“八点半至上坝营造学社，再看梁夫人病。大家坐廊下，颇风凉。徽因卧一行床，云前日因起床过劳，又有微热，诸人劝勿多说话，乃稍久坐……三点，思成送至轮边，余对此小夫妇更为系念也。”

在梅先生这一段记述中，举重若轻地出现了许多人名，都是在中国文化、科学史上响当当的灿烂星辰，在民族的危难时刻毁家纾难，僻处西南，笳吹弦诵，薪尽火传。

这些人川的文化机构、大学、研究所，之所以分散于板栗坳、石岩湾、慧光寺、羊街、上坝等各地小镇山沟，是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轰炸。《长相思》中详细讲明了原委：“成都、重庆自是轰炸目标，川南部分，宜宾和泸州也挨炸。宜泸之间的小县小镇才安全。戏剧专科学校逃了江县，一个大小学（指同济大学——笔者注）和研究所（指史语所——笔者注）选了南县九龙镇。九龙镇也拉警报，不过明知日本飞机只是路过，不会丢炸弹。大家带上茶和花生米，教授学生挟上书，向镇子四边的竹林、桐子林里走去。找块地方坐下来喝茶、读书，倒是又得浮生半日闲……茶馆里坐着许多大学生，有的说说笑笑，有的还真是在看书。”

对照至此，掩卷细品，《长相思》《梅贻琦日记》这两部文化底蕴深厚的巨著，竟于无意间彼此成就了对方，凑拢比较，互相有了一次最有蜀地风味和时代内涵的有关时、地、名与川南风俗的情感丰富的笺注。



左：卡夫卡《判决》手稿第一页 右：《卡夫卡传》德文版

